

殖民地的歐籍人一樣，擔心與華人接觸太密切，會在生理和道德上帶來嚴重風險。大多數香港歐籍人相信，這個殖民地的命運全繫於歐籍人的健康。與華人的接觸愈來愈多，又面對華人資產階級愈來愈強的經濟競爭，都令歐籍人惴惴不安，這些限制性的行動旨在維持在港歐籍人上流階級的地位和社會結構。

對於香港如此無處不在的種族歧視，香港華人和歐亞混血兒有何感受？何東女兒鄭何艾齡說，對於1918年制定、禁止非歐籍人居住太平山的《山頂區條例》，「香港華人和其他亞裔居民深惡痛絕」。¹⁴但是，立法局華人議員沒有反對該條例，直至1925年至1926年省港大罷工期間，才有聲音要求准許華人住在太平山，而提出這種要求的人卻是大罷工的組織者，就算開放太平山讓華人居住，他們也不會住得起。到了1919年，政府又制定另一條類似法例，保留長洲部分地區供英美傳教士渡假之用，這次遭到立法局華人議員反對，劉鑄伯對於竟然連傳教士都有這種行徑感到震驚和失望；何東之弟何福指摘這是「種族歧視法例」而加以撻伐。在1930年代，少數華人獲行政局准許在長洲該區域居住。但這些有關山頂和長洲的法例，直至1946年才撤銷。

富裕華人和歐亞混血兒對種族歧視的通常反應，是創造專屬於他們的社交世界。這些領袖常自視為一個特殊階級的一員，有別於其他本地華人，也不同于中國大陸同等階級的人物。例如，一批華人精英在1901年3月聯名具稟港督卜力，請准成立一所專為他們的子女而設的學校。聯署者都是香港最顯赫的華人名流：何啟是大律師、醫生、財務家兼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何啟的好友韋玉是最早到英國求學的華人之一，也是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且是利銀行買辦和東華醫院前主席；曹善允則

是在英國受教育的著名律師。這些聯名上稟的人認為，現時在官立學校對於「社會和道德背景迥異家庭的兒童不加區別，而使他們密切雜處在一起」，使得「有名望的華人家庭子女不以為然，認為不適合他們入讀」。雖然華人社會有人反對，但他們倡辦的這所新學校終於在接下來一年興建。

香港華人資產階級領袖也成立幾個專屬會所和協會，以鞏固和保持他們的精英地位。幾名被禁加入香港會的華人和歐亞混血兒翹楚，在1899年成立自己的會所——華商會所。創辦人包括歐亞混血兒何東、何甘棠兄弟，另一創辦人關景良則是最早在香港行醫的華人西醫之一。華商會所會員和主席都是商人和專業人士，全是香港華人和歐亞混血兒社群的頭面人物。另一個上流階級會所是1912年由何啟、韋玉和另外幾位華人名流創立的中華遊樂會。它的會員除了可以參與木球、網球和桌球這些英式運動和玩意外，還可以練習國術或打麻將。比運動更重要的是這些機構和環繞它們的功能。跟英國人的會所一樣，中華遊樂會篩選會員的過程很嚴格，會籍費用也很高昂。該會的規則十分嚴格，打木球和網球需要穿正式得體的白色球服。該會主席和會員都是這個殖民地內最有名望的華裔和歐亞混血裔男性。

香港和中國民族主義

歷史學家常常強調，香港對於中國在十九世紀末至1900年代初的國族建設有很大貢獻。如中央書院這些本地學校的學生，不少人畢業後投身中國公務機構和中國海關，為國效力。另一些曾在香港受教育的華人，最後在中國擔任教師、醫生、科學家和工程師。香港企業家大量投

14 Irene Cheng, *Clara Ho Tung: A Hong Kong Lady, Her Family and Her Tim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76), xiv.

資於華南的商業和工業活動，並捐貲造福桑梓，興辦慈善、教育事業，建設公共設施及資助醫療項目。香港也是華南的匯款中心，超過百分之五十的僑匯是經香港匯回中國。

許多香港華人也參與民族主義抵制運動，如 1905 年至 1906 年的反美抵制運動。在整個 1880 年代和 1890 年代初，美國政府頒佈一系列排華法案禁止華工入境，而其他在美華人也遭到歧視和暴力對待。1905 年 7 月，波士頓移民官員沒有逮捕令就拘捕一名華人，此人在美國駐上海領事館前自殺，引發中國大規模抵制美貨運動。香港許多華商領袖反對抵制，擔心會損害香港經濟，但老師、學生、記者和商人進行到底。有些商店拒賣美貨；華人報章大幅報道抵制運動的過程，又拒登美國貨廣告；轎夫和人力車夫不肯接載來港訪問的美國戰爭部長塔夫脫（William Taft）（他重達三百磅，確實是不小的負擔）及其隨員；一批華人富商，包括在加州發家致富的李煜堂，成立了拒約會（抵制苛約不用美貨公所）。

另一場同樣顯示中國民族主義的事件，是由 1908 年 3 月持續至 12 月的反日抵制運動。事件起因是日本貨輪「二辰丸」走私軍火到廣東，遭中國政府扣押，日本政府卻強迫中國謝罪道歉，廣州華人視之為國恥，憤而發動抵制日貨抗議。香港的抵制日貨運動主要由本地商人組織，聲勢比廣州更加浩大。違反抵制令的商人會被罰款，敢死會則揚言，會把破壞抵制活動的商人殺死和割掉耳朵。在 11 月初，有暴徒襲擊出售日貨的商店。雖然參與抵制行動的人沒有攻擊日本公司，但殖民地政府須為它們提供保護。為抗議警察射殺兩名參與騷動的華人和拘捕至少一百人，並且不經審判就把抵制運動領袖驅逐出境，華人商店罷市兩週；有人從滙豐銀行提走巨款。歐籍商人擔心大力彈壓會令華人恐慌，損害貿易，因而勸說政府不要太強硬拘人。當日本出口到香港的貨品減少逾三分之一之際，日本副領事試圖與華人商界領袖重修舊好。抵制行動在

1909 年 1 月結束，但該年後期為抗議日本對中國東北擴大勢力範圍，抵制行動死灰復燃。

香港的殖民地環境，也令它能在辛亥革命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場革命推翻了滿清政府，建立中華民國。獲華人尊稱為「國父」的孫中山曾在香港受教育，他最初入讀中央書院，後來考進香港西醫書院。雖然港府致力不讓香港成為顛覆基地，但這個殖民地還是成為中國革命黨人招兵買馬和受訓的根據地。孫中山在檀香山唸書時在當地創辦興中會，後來在香港建立興中會香港分會。他在 1905 年又於東京創立同盟會，這個革命團體在香港也很活躍。香港是自由港，可以輕易取得來自日本和西方的軍火，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因而能在此地籌劃一連串秘密活動。1895 年第一次廣州起義¹⁵是在香港策劃的；1900 年在距離新界只有十英里的惠州發動的第二次起事¹⁶，也是在香港謀劃。原定 1903 年 1 月起事卻未舉而敗的廣州起義¹⁷，也曾在香港策劃。這個殖民地還有大量支持革命黨人的本地組織，而本地華商也出資支持革命。

由於香港有較大的新聞自由，如《中國日報》等革命報章都在香港出版並發行到海外華人社會，它們不單在此地與保守派報章論戰，反駁它們提出在中國實行漸進改革的主張，還可以公開鼓吹革命。香港也充當了華人改革家和革命黨人的庇護所。孫中山在 1895 年起義失敗後就避禍於此。1898 年夏天推行的百日維新失敗後，維新派領袖康有為在英國政府協助下流亡香港，他剛到達時，殖民地政府還派員保護。興中會領袖楊衢雲在 1900 年起義後寄跡香港。1901 年楊衢雲被清廷刺客刺殺，香港政府甚為尷尬和憤怒，遂派警察保護另一革命黨人陳少白，並發給他

15 譯註：乙未廣州之役。

16 譯註：庚子惠州之役。

17 譯註：洪全福廣州之役。

可攜槍自衛的許可證。

和其他殖民地的政府一樣，香港政府無心插柳助長了華人民族主義的成長。為免鼓勵排滿或革命情緒，港府不在本地學校教授中國近代史。但是，殖民地教育的課程內容包括議會政體等課題，因而鼓勵學生思考政治，塑造了他們的政治意識。此外，在中央書院這類學校中，學生接觸到不同國籍和背景的師生，學校圖書館藏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書刊。1923年孫中山在香港大學演講，宣稱他的革命思想發源地「即為香港」。他說，香港的秩序整齊而安穩，與中國的混亂腐敗成強烈對比，激發他發動革命。「我恆默念……何以如此不同？外人能於七八十年間在一荒島上成此偉績，中國以四千年之文明乃無一地如香港者，其故安在？」（但有一點孫沒有提到：他在觀察到1884年的反法示威後，知道香港可以為他的革命活動提供有利的環境。）

雖然港府對於中國革命黨人的官方政策是保持中立，但香港政府要小心走一條很窄的鋼索。它和大多數香港華人一樣，支持中國的政治變革。英國政府命令殖民地政府不要讓香港變成顛覆基地，但港府不能鎮壓革命活動，以免華人子民離心（但1907年為防止香港成為反清排滿情緒的重鎮，港府頒佈《中文出版物條例》¹⁸）。因此，在1896年3月，港督羅便臣拒絕廣州當局要求，不把一名孫中山追隨者引渡到中國。政府也沒有試圖取締興中會這些革命組織。但在1896年3月，羅便臣向孫中山發出驅逐令，限制他五年內不得進入香港，那時孫中山去了夏威夷籌款，正在返港中。羅便臣堅稱，香港政府不容許這個殖民地「被人用作庇護所，在此策劃叛亂或陰謀，危害友好鄰國」。¹⁹

18 譯註：又譯《禁止報紙登載煽惑友邦作亂之文字專律》。

19 CO 129/283, October 4, 1897, Lockhart to Sun, reprinted in Tsang,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278; also quoted in Chan Lau Kit-ching,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1895-1945*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5.

孫中山被港府驅逐之事，在1897年為香港和英國政府帶來尷尬，孫中山在那年於倫敦被清廷密探綁架，扣留在倫敦的中國公使館。直至孫中山之友、曾是香港西醫書院教務長的康德黎（James Cantile）聯同外交部介入營救後，孫才得以脫身。一名英國士兵把驅逐事件向本地報章透露後，報界和英國政治家詰問：為何孫中山在英國是政治難民，在一個英國殖民地卻沒有相同權利。最後，張伯倫裁定，因為孫中山在驅逐令發出前業已離境，該令仍有效。1899年10月維新派康有為回到香港，清政府以他陰謀顛覆清廷為由，要求將他驅逐。港督卜力指康有為並沒有製造麻煩，英國外交部拒絕清政府的要求。但到了同年12月，外交部認為，容許康有為留在香港，可能會授人以柄，其他國家會以此指摘英國助長中國的叛亂。最後外交部以新加坡較安全為由，婉轉地建議康有為前往新加坡。

不過，我們不能過於高估香港對中國民族主義壯大所發揮的作用，這是有理由的。如歷史學家陳劉潔貞所說，香港人對於中國所發生事件的關注，充其量只是「半溫不熱」。²⁰ 革命刊物存在的時間全都不長，雖然革命記載把香港描繪為革命的孕育地，但事實上同盟會香港分會的活動，並非如這些記述所說的那樣廣泛和有效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香港也沒有參與策動。《中國日報》那些報章的影響力很小。興中會在1895年和1900年起義失敗後就銳氣頓失。香港所孕育的，似乎反而是一種保守的中國民族主義，而這種民族主義受香港的英國殖民地地位所塑造。

試想想何啟的經歷，他屬於在香港和條約港冒起的一小撮改革者，人們認為孫中山的政治思想是受這批人影響。像何啟這類在香港出生和受教育的人，一方面自視為一個得天獨厚團體的一員，不獨在香港如

20 Chan Lau, *China, Britain and Hong Kong*, 4.

此，在大中華世界和大英帝國也是如此。但他們和中國國內和海外的許多華人一樣，愈來愈關注祖國的命運。何啟之父是新教牧師，又以炒地皮和經商為業，何啟身上所體現的民族主義，是與他所生活的殖民地環境密不可分的民族主義。他所受的完全是英式教育，先後在香港和英國的學校就讀，早年在中央書院求學，其後負笈英國，修讀醫科和法律。

何啟在 1882 年回到香港，掛牌行醫一段短時間後，轉而發展大律師事業，又像其父一樣投資房地產和本地生意，在公職方面也事業顯赫。他在 1890 年獲委任為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並且是雅麗氏利濟醫院（以其亡妻雅麗氏〔Alice Walkden〕命名，他倆是在英國結婚）和香港西醫書院主要創辦人，他在香港西醫書院教授生理學和法醫學，又兼任保良局和東華醫院顧問，此顧問職務是由政府委任而非由華人推選。何啟因服務殖民地和英國政府的功績卓著，在 1892 年獲頒聖米迦勒及聖喬治勳章（Companion of the Order of St. Michael and St. George），1912 年更獲冊封爵士。

何啟深受洛克（John Locke）、亞當斯密（Adam Smith）、邊沁和穆勒等自由主義思想家啟發，認為英國統治有解放之功，而非專事壓迫。他相信，香港可以在商業和政治上垂範中國，而中國應借鑒英國，實行人民主權的君主立憲制。他為香港感到自豪，認為香港的繁榮和政治穩定，是任何中國城市均難望其項背，而且香港政府沒有那麼腐敗和高壓，香港的教育和公務員制度是中國所望塵莫及。香港代表兩個世界的精髓——由英國人自由貿易原則和自由開明管治所支持和保護的中國工商企業精神。香港得益於商業發展，變得比中國更繁榮和穩定，因此，治療中國的良方，同樣是以英式自由主義和議會政治為支柱的商業發展。何啟與其友胡禮垣發表了一系列政論文章表達這種思想，並在 1900 年結集為六卷本的《新政真詮》出版。

何啟在世紀之交也參與革命活動，並在興中會歷史中扮演重要角

色。他與其他幾名本地華商資助興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並協助策動 1895 年的廣州流產起義。在謀劃 1900 年的惠州起義期間，何啟嘗試利用自己與香港英文報界的聯繫，代表孫中山的革命黨人爭取英國人協助，或至少確保香港政府會善待革命黨人（在外交部的壓力下，殖民地政府准許清兵取道香港去鎮壓起義）。在 1900 年的惠州起義後，何啟在革命活動方面的參與已大不如前，也很少擔當中國革命黨與香港政府之間的中間人，但他對中國事務的關注並沒減少。反之，何啟認為中國不應實行共和政體，而應像英國那樣實行君主立憲政體，所以他開始覺得孫中山及其革命黨人的共和理念過於激進。但何啟終其餘生仍致力於促進中國的福祉。在今人眼中，何啟是影響深遠的改良派。一位歷史學家稱他的著作是中國改良運動中「具象徵意義的轉捩點」。²¹

辛亥革命及其對香港的影響

在 1911 年 10 月 10 日，駐紮武昌的一支清廷新軍部隊起義，奪取了城內一個軍械庫。其後，兩個鄰近城市²²軍中的革命黨人聞風而動，相繼發難，武昌宣佈獨立。這觸發各地紛紛響應，兩星期內有十省宣佈獨立，及後其他各省也陸續脫離清政府。1912 年 1 月 1 日，起義軍成立中華民國，定都南京，並推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辛亥革命爆發，令香港各界華人為之振奮歡騰。港督盧吉（Frederick Lugard）寫道，革命的消息傳來，「頓時全城沸騰，這種不可思議的景

21 Lloyd E. Eastman, "Political Reformism in China before the Sino-Japanese War,"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7(4) (August 1968): 698, 709.

22 譯註：漢陽和漢口。

象，是此殖民地歷史上前所未見，聞所未聞……全體華民此刻似都欣喜若狂」。²³ 1911年10月18日，四百名群眾遊行到中國銀行²⁴和一家保皇派報章²⁵的香港辦事處，強迫他們取下滿清黃龍旗。馬應彪和李煜堂等商人成立粵東紅十字會，提供藥物和醫護人員治療參與革命的傷員。東華醫院籌集食物賑濟逃避兵燹的難民，學生和商人募款支持起義軍，剪髮匠免費替人剪辮子（清廷強迫清帝國所有男子像滿人一樣留辮子），愛國妓女則宣佈捐出一半收入資助革命事業。革命後，香港也成為前清遺老避難之地。這些官員和家眷在這裏興建中式別墅，以聽音樂、作詩和打麻將度日，儼如流亡貴族。

革命黨人為了令外國列強保持中立，不鼓勵排外情緒，但許多在港華人認為，既然已驅除滿人，接下來應該輪到英國人。殖民地政府查獲製炸彈工場，香港各處爆發暴亂。群眾搶掠商店，向警察擲石，港督現身公眾場合也遭扔石，還有人試圖劫獄營救囚犯。在有歐籍人在街上遇襲後，他們爭相購買槍械。被警察拘捕的人太多，以致監獄當局在一些囚犯刑滿前就釋放他們。1912年7月，一名年輕華人刺殺新任港督梅含理（Francis May，又譯梅軒利）不遂。雖然這宗刺殺事件似乎沒有政治動機，但從中可見辛亥革命在香港引發的緊張局勢。

這場民眾動亂為時很短暫，一方面由於它主要局限在香港低下階層，另一方面也因為新成立的廣州政府表明不予支持。香港華人精英雖然支持革命，但不想它損害香港的經濟和政治穩定。革命後不久，立法局兩名華人議員何啟和韋玉投票支持修訂《維持治安條例》（Peace Preservation Ordinance），批准對因煽動暴亂被囚在獄的人施以笞刑。

23 Quoted in Frank Welsh, *A Borrowed Plac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New York: Kodansha, 1993), 353.

24 譯註：大清銀行。

25 譯註：保皇會機關報《商報》。

1912年總登記官在報告中說，中國「革命所孕育的激昂情緒」加上「愚昧無知的政治熱情」，帶來了「凶險情勢」和「肆意妄為之徒可乘之機」，不過，全賴團防局「眾士紳不辭勞苦」，「殖民地上各人恪守法紀，治安平靖，他們功不可沒」。²⁶ 不過，辛亥革命後，香港政府對中國和香港的革命活動感到憂慮。在1913年，港督梅含理制定《教育條例》（Education Bill），要求所有私立學校向政府登記。梅含理聲稱目的是為提高這些學校的教育水準，但他與殖民地部之間的通信顯示，他其實是要防止這些學校變成反英宣傳基地。1914年頒佈的《煽亂刊物條例》（Seditious Publications Ordinance），則是針對任何可能破壞香港或中國穩定的刊物。

現今華人世界全都推許辛亥革命是中國歷史上光輝燦爛的一頁，但是，跟大多數革命一樣，它所引起的問題並不少於它所解決的問題。1912年3月取代孫中山成為總統的北洋軍領袖袁世凱，無法凝聚團結新生的民國。雖然袁世凱致力維持秩序和統一，並推動中國現代化，但他對於保住自己的權力同樣不遺餘力。1913年他刺殺國民黨領袖²⁷，鎮壓孫中山領導五省反袁的二次革命。翌年袁世凱解散各省議會。他聽信美國政治學家²⁸之言，認為中國還沒有條件實行民主後，在1915年復辟稱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袁世凱於1916年去世，但在他死前，中國的權力已開始流到軍閥和軍事領袖之手，這些人崛起成為新的掌權者。中國遂陷入政治上四分五裂的局面，直至1920年代末。

辛亥革命無法令中國成為穩定的共和國，對香港有兩個重要影響。到了1913年，許多香港華人對於孫中山已熱情不再，當年6月孫中山訪港，大部分時間受到冷待。香港政府和本地華人精英確實都支持袁世凱

26 “Report of the Registrar General for the Year 1912,” *Administrative Report for 1912*, reprinted in Tsang,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209–10.

27 譯註：國民黨代理事長宋教仁。

28 譯註：古德諾 (Frank J. Goodnow)。

鎮壓孫中山的二次革命。辛亥革命為香港帶來太多煩擾：每天都有大量難民從中國湧入，到了1914年，香港人口達到五十萬。這場革命也根本改變了香港與中國的政治關係。因為北京政府只是名義上統治中國，香港政府須與廣州此起彼落的歷屆政府直接打交道，其中幾個廣州政府還試圖破壞香港的政治和經濟穩定。因為英國外交部繼續承認在北京掌權者為中國合法政府，這常引致外交部和香港政府之間的摩擦。

1912年至1913年拒搭電車運動

1912年至1913年的拒搭電車運動顯示，香港如何受革命時代中國國內政治變化劇烈的影響。在1912年4月，香港政府禁止中國錢幣流通。自香港開埠之初起，廣州與香港兩地的經濟已是息息相關，而中國錢幣從一開始就在香港流通。但辛亥革命後，廣東局勢惡化，廣東的中國錢幣貶值，港府愈來愈擔心這些貶了值的錢幣流入的影響。許多香港華人把禁令視為對新生的中華民國的侮辱。在同年11月，港督梅合理勸說天星小輪、電車公司和山頂纜車停收中國錢幣。這引發華人更大的憤怒，因為香港錢幣比中國錢幣少，香港錢幣供應不足令本地居民缺少付電車車資的錢。全港爆發拒搭行動，它的組織者以各種方法威嚇那些違反拒搭命令的人。

1912年12月，梅合理促請華人社會的頭面人物協助結束拒搭行動。他指電車公司不收中國貨幣純粹是經濟決定，並無侮辱中國之意，而拒搭電車只會損害香港和中國，因為有不少華人資金投資在電車和纜車公司。在12月20日，何啟和韋玉這兩名立法局非官守議員，在一次華商公局會議上為電車和纜車公司辯護，並譴責拒搭行動損害香港和廣東的

經濟。他們說，香港經濟不振，那麼香港居民能用於接濟廣東親戚的錢就更少了。在本地華商幫助下，拒搭行動在1913年2月初結束。雖然幾名與政府合作結束拒搭的華人接到恐嚇信，但梅合理仍對華人名流感到失望，因為現在這些人在華人社會之中，似乎已不再有一呼百應的能力。他對於何啟和韋玉那麼遲才出手了結拒搭事件尤其不悅。事實上，何啟沒有及早協助政府，是他無法五度連任立法局議員的原因之一。拒搭電車行動失敗收場，令政府的威信上升。

香港大學

香港第一所大學在辛亥革命後不久成立。推動成立這所大學的是1907至1912年出任港督的盧吉。盧吉在大英帝國歷史上最著名之舉，是在非洲實行間接統治制度，這套制度允許土著統治者在英國居民監督下保持權力。盧吉在到港五個月就醞釀成立大學的構想。當時香港唯一的高等學府是1887年成立的香港西醫書院。

要為成立新大學籌措經費絕非易事，過程中也顯露出無論香港或英國都有人對香港激進主義和高等教育感到憂慮。帕西商人麼地(Hormusjee Mody)提供近一萬八千英鎊興建大學校舍，另加一筆慷慨捐款，他後來因熱心捐輸和對英國政府貢獻卓越而獲封爵士。但許多華人精英不願解囊相助，因為他們不想捐款給一所自己沒有監督權的學府，此外，從國外大學學成回港的學生沾染了激進思想，也令他們憂心忡忡。在港英商群體更加猶疑，認為盧吉成立「遠東的牛津和劍橋」的大計，不過是當時英國及其殖民地「大學熱」的另一例子。如盧吉寫給妻子(著名記者弗洛拉·蕭〔Flora Shaw〕)的信中說：「那些唯利是圖的質

易商擔心，如果中國人接受了我們的教育，就會成為他們的勁敵。」²⁹ 殖民地部把建大學的構思稱為「盧吉爵士的寵物羊」，倫敦有些官員憂慮提供純粹的世俗教育，會助長排外主義和激進思想。

終於，必要的資金都募齊了。本地華商吳理卿捐款興建解剖學館。一位來自海峽殖民地的華商捐資成立文學院。其後，歐亞混血兒何東捐款成立外科醫學講座教授席。至於本地英商，要待到盧吉夫人向他們的倫敦總部游說後才肯捐款。太古洋行捐出四萬英鎊，這主要是因為該公司一名收票員被指踢死一名年老華人，太古希望藉大手筆捐款化解該公司可能遭到的抵制³⁰。北京和廣州政府也各捐二萬五千英鎊，英國政府最吝嗇，僅捐出區區三百英鎊，成立英王愛德華七世獎學金。

香港大學在 1912 年 3 月 11 日正式成立，有大約七十名學生，分別來自香港、廣州和其他條約港，以及遠至海峽殖民地（經過一番爭取後，港大到 1921 年才兼收女生）。1917 年一份本地英文報章的編輯寫道：「在地圖上，香港這個殖民地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點，但在商業、工業和教育各方面，它於遙遠的東亞點燃着英國傳統和高水準的明燈，並將薪火傳遞。」可是，盧吉希望港大成為遠東的牛津和劍橋的夢想從未真正實現。開辦這所大學原是想吸引來自中國大陸的學生，但中國學生更為嚮往的，仍是日本大學及美國傳教士在華開辦的大學。港大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真正發揮潛力。

29 Quoted in James Pope-Hennessy, *Half-Crown Colony: A Hong Kong Notebook* (London: Jonathan Cape, 1969), 129.

30 譯註：事件發生在 1908 年該公司經營往來香港至廣州航線的「佛山」輪。

香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六至十萬名華人居民擔心香港會受襲，暫時搬回廣東避禍，但戰事沒有直接波及香港，而且從沒面對真正的軍事威脅。除了通貨膨脹和某些貨品受到管制外，戰爭也沒有為香港帶來嚴重的經濟威脅。歐洲貿易撤出亞洲，本地華資公司因而得益。由於殖民地內約四分之一的歐籍男人奔赴戰場前線，華商得以大舉進入銀行和航運等從前由歐籍人把持的商業領域。至於樟木、糖薑、藤器、肥皂、鼓油、煙草和朱砂等規模較小的華人傳統工業，仍然繼續發展，但已不再是華人工業家的焦點。一戰期間香港發生了一些嚴重事故，卻與戰事無關：1918 年 2 月跑馬地馬場大火，導致六百人死亡，四百人受傷；同年年底，擁擠的華人房屋爆發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超過一千人死亡。不過，戰爭確實深刻影響了歐籍人社群，因為德籍婦孺全被遣返，男人則被拘留直至戰事結束。

香港和大英帝國其他地方一樣，也出一分力支援英國參戰。幾近百分之二十五的英籍男性自願參軍，並有大量華工在法國的華工軍團中服役。華人和歐籍人都向戰爭慈善事業捐款，籌募戰爭開支。華人業主同意開徵百分之七的特別戰務差餉，在戰爭最後兩年籌得超過二百萬港元。歐亞混血裔大亨何東捐款購買兩架飛機和幾輛救護車送給英國政府。華人保險業及航運業鉅子兼地產商周少岐出任戰爭慈善事業委員會委員。

1919 年 7 月，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全港各界同慶和平，大放煙火，又舉行花車巡遊和閱兵，街道遍掛燈籠和盟軍旗幟。華商組織了一英里長的巡行隊伍，由跑馬地走到中環，帶着各種動物形狀花燈，隨

後最矚目的是一條巨龍。許多人從廣東省來港觀看慶典，觀者如堵，以致電車停駛。但是，和平慶典過後一週，香港就爆發開埠以來首見的搶米風潮。雖然這場風潮很快平息，但卻預示着 1920 年代將會影響香港的一些重大事件。



快活谷賽馬，1902 年。

(Courtesy of the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